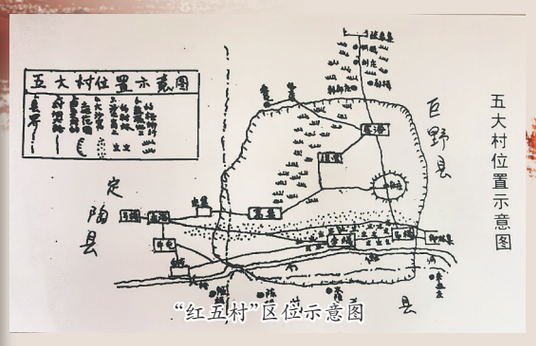
烽火古槐新生记

——巨野“红五村”的根脉与振兴路

巨野县柳林镇蒋海村村史馆东侧，一棵曾遭日军焚烧的古槐树，从焦土中再度生芽，如今已是亭亭如盖。

10月20日，记者来到蒋海村，见到了这棵“奇观”之树。秋阳之下，古槐树干半边枯朽如炭，仅余一人多高的空壳；另外半边却枝干遒劲，绿叶葱茏，树影覆地数丈。

这棵古槐，见证了柳林镇“红五村”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。80多年前，日军焚烧了它的主干。几年后的春天，焦黑的树桩旁竟抽出新芽，年复一年，终又长成参天大树。它正如这片土地上的百姓，历经战火摧残而愈加坚韧，终在废墟中站起，于灰烬中开花。



“红五村”区位示意图

蒋海村村史馆

刘爱荣讲述“红五村”的抗战事迹

家国危难中的人民血性

柳林镇是一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土地。1938年，日军侵占巨野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加之日伪苛捐杂税，广大群众深陷苦难。那棵古槐，也在这场浩劫中被烈火吞噬，树心焦裂。

危急关头，位于巨野县西南、万福河北岸的蒋海、马楼、徐堂、葛集、大李楼5个村庄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，置枪设炮、挖沟筑寨，展开武装自卫斗争。1940年，在八路军教3旅9团的帮助下，他们成立了抗日反顽自卫队。

五大村抗日反顽纪念碑

1941年1月5日，顽军卞九部千余人进犯葛集。敌人趁夜翻越寨墙、打开寨门，冲进村内焚烧草垛，借火光扫射村民。巡防人员发现后鸣枪还击，全村群众擂鼓呐喊冲到街头，凭借房顶巷口与敌激战。四村援军闻讯赶来，将葛集包围。激战持续至次日上午，群众用湿草车掩护前进，夺取三处宅院，将敌人逼入胡同。

“战斗最激烈时，连老人、妇女都上了阵。”蒋海村村党支部委员刘爱荣说，“听老一辈讲，大家投砖掷弹，打得敌人四处躲藏，最终仓皇撤退。”此役毙敌30余人，“五大村”反顽首战告捷，极大鼓舞了周边群众的抗日斗志。

此后，“五大村”多次挫败敌人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，在民间赢得“红五村”称号，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。1940年至1942年间，“红五村”歼灭敌军数百人，缴获枪械数十支。这片土地上的抗争，如古槐新芽，虽经战火而重生，终成参天之势。

在残酷斗争中，“红五村”群众不仅英勇无畏，更展现出高超的斗争智慧。

1942年12月，巨南五县联合办事处主任牛连文率部分自卫队员行军时，与日军中队遭遇。日军见我方人少，发起追击。牛连文带领队员边战边退，撤至蒋海村。面对严峻局势，他们决定将日军引至有顽军第7师驻守的孟海村。自卫队员安全转移后，蒋海村蒋来让等5人执行诱敌任务。深夜，日军进犯蒋海，蒋来让巧妙将其引至孟海，引发双方激烈交火。

拂晓时分，日军攻入村内才发觉中计。此战双方各伤亡80余人。这场“狗咬狗”的战斗，成为当地群众津津乐道的抗战佳话。

红色血脉浇灌小镇新生

走进蒋海村村史馆，珍贵的文物、生动的图片与翔实的史料，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。柳林镇武装部国防教育基地里，一面面锦旗、一枚枚勋章，默默铭记着民兵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……

红色基因已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，成为柳林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。近年来，柳林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，通过组织开展民兵风采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乡村等活动，以宣讲、展览、互动等多种形式，将红色精神传递到每个角落，让更多人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，激发爱国情怀。

昔日烽火连天的“红五村”，如今被一条条平坦的农村公路紧密串联。近年来，柳林镇将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列为头号民生工程，坚持内外兼修，绘就路畅、业兴、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。

柳林镇的交通变革是一场双向发力的系统工程。对外，该镇协同县交通部门提档升级县域主干道，畅通对外“大动脉”；对内，则攻坚“末梢梗阻”，推动硬化路无缝衔接千家万户，疏通内部“毛细血管”。同时，全面落实“路长制”，将管养责任细化到人，实现农村公路网格化、精细化管理全覆盖。

如今，驱车行驶在柳林镇，条条平整的农村公路如玉带般在乡野间纵横交错。公交车辆穿梭往来，便利村民出行；满载农产品的货车畅通无阻，驶向广阔市场。

道路通达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目前，全镇已拥有各类服装加工点300余处，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，年产值突破6亿元。这些“家门口的工厂”既壮大了镇域经济，更让众多村民实现就近就业，走出一条以路兴产、以产促富的乡村振兴之路。

离开时，记者行至村口，回首仍依稀可见那棵“重生”的古槐。树下，新的故事正在生长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劭

蒋海村老槐树

智斗“柳疤瘌”

从前，郓城县城南有一户姓柳的地主，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大疤瘌，村里人都叫他“柳疤瘌”。柳家有十几顷（1顷等于100亩）好地，雇了三个长工，分别是张三、李四和王五。“柳疤瘌”对长工们很刻薄，每天天不亮就催他们下地干活，太阳落山才准回家吃饭。

有一天，天气阴沉。三个长工望着天空，张三说：“天上黄澄澄。”李四说：“眼看要刮风。”王五说：“刮风就有雨。”张三接着说：“下雨咱歇工。”正巧他们的话被柳疤瘌听见了，他走过来说：“下雨好，下雨好，一个去推碾，两个来铡草。”说完就吩咐：“张三去碾房推碾轧料，李四和王五到草棚铡草。想歇工？哼，没门！”三个长工憋了一肚子气，也只好照做。

有一回，“柳疤瘌”看见张三去别人家茅房解手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马上把三个长工叫到跟前说：“你们吃我的饭，怎么能去别人家茅房解手？听着，以后解手都必须到柳家茅房！”张三生气地说：“东家，管天管地，还管人在哪儿解手？”“柳疤瘌”说：“要知道，你们都是我花钱雇来的，干什么都得听我的。记住：干啥不依东，累死也无功。懂吗？”说完背着手走了。张三对另外两人说：“这家伙对咱们太歹毒了，得想法子治治他。”

一天，“柳疤瘌”吩咐三个长工去村外五里远的地方锄地。到了地头，三人先坐下抽了袋烟，接着张三说：“走，回去。”李四、王五问：“咋回去？不干活了？”张三回答：“回去解手。东家不是说解手都得去他家茅房吗？”李四、王五一听就明白了。三人回到村里，张三进了柳家茅房，李四、王五在外边等着。“柳疤瘌”看见了，就问：“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活儿干完了？”李四说：“活儿还没干，我们想解手。张三正解着呢，他完了我们接着解。”“柳疤瘌”一听火冒三丈：“跑这么远就为解手？还干不干活了？我扣你们工钱！”张三在茅房里说：“你让我们解手必须到柳家茅房，还说‘干啥不依东，累死也无功’，所以我们才回来解手。”“柳疤瘌”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干生气。

又过了几天，天气很好，三个长工却没见“柳疤瘌”来派工，心里纳闷：今天东家怎么舍得让他们歇着？李四、王五让张三去“柳疤瘌”住的堂屋看看。张三走到窗外，听见屋里吵吵嚷嚷，又哭又骂，还有摔东西的声音——原来是“柳疤瘌”正和老婆打架。张三在窗外问：“东家，今天我们干啥活？”“柳疤瘌”正在气头上，随口说：“还干啥活？东西都摔坏了，做个球啊！”张三听了，计上心来，既然你说“做球”，咱们就做球。于是，他让李四、王五挑水和泥，在门外场地上做起泥球来。

“柳疤瘌”和老婆打完架，气消了，都快晌午了。这时他才想起还没安排长工干活。走出大门，只见场院外摆满了一个个小碌碡似的大泥球。“柳疤瘌”急了，问：“你们这是在干啥？”张三说：“你不是叫我们做球吗？看这大小行不行？”“柳疤瘌”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叫你们做啥球啊？赶快拉倒（方言：停下）吧！”张三说：“好，拉倒就拉倒，拿绳子去。”李四、王五拿来绳子，横向一拉，把泥球全拉倒了。“柳疤瘌”看了，气得直嚷：“你们滚，滚，都给我滚！”张三问：“滚哪儿去？”“柳疤瘌”吼道：“都给我滚回家去！”三个人也不回话，把大泥球一个一个往“柳疤瘌”家里滚。“柳疤瘌”见状，气得脸色铁青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竟咽了气。

至今，长工们和“柳疤瘌”斗智斗勇的故事还在民间广为流传。 魏建国

萧姓始祖考释

萧姓在菏泽市内广有分布。中华历史上曾有嬴姓萧国和子姓萧国两个萧国，萧国即为萧姓的发源地。

第一个萧国为夏朝所封的嬴姓萧国，亦称古萧国，位于今安徽省宿州市萧县西北一带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辅佐禹治水的“伯益（大费）生有二子：一为大廉，为鸟俗氏；二为若木，为费氏。”大廉侍奉夏启，子孙众多，其中孟亏因擅长先祖调驯鸟兽之术，深得夏启器重，被赐封于萧地为诸侯。《路史》载有“夏启使孟作土于萧”的记载，因当地多生萧茅（艾草又名萧茅、蓬藁），故命国号为“萧”。（《萧县毛传》记载：“萧”为“藁”，即蓬藁。夏代殷商六族迁居此地，“斩其蓬藁、藜藿而处之”，并在此建立古萧国），萧人以国为姓，称萧氏，故有萧孟亏。从萧茅到萧地，再到萧国，最终产生萧孟亏，萧孟亏成为中华史籍记载中最早的萧姓之人。商灭夏后，萧国降为萧邑。虽然西周以前的文献带有传说色彩，但嬴姓萧国被周公旦所灭是历史事实，因此嬴姓萧氏的存在是有据可考的。

周灭殷商后，封微子启于宋，史称宋国公，萧邑属宋国管辖。公元前682年夏，宋闵公被南宫长万杀害，国内大乱。宋始祖微子裔孙、萧邑大夫萧叔大心（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记载：萧叔为宋戴公子的裔孙，受封为萧邑之宰，故称“萧叔”）因平定叛乱，扶持闵公之弟御说继位（《左传·鲁庄公十一年》记载：萧叔率五族之众击败南宫长万，迎御说即位，是为宋桓公），立下大功，被宋桓公分封于萧，并将萧邑升格为国，作为宋之附庸，赐封大心为侯爵、萧国君主，是为萧大心。春秋争霸时期，公元前597年，萧国为楚国所灭。其子孙未能复国，遂以封地“萧”为氏，以纪念故国，称为萧姓。

春秋时期的这个萧国，源于“姬”姓，再出于“子”姓，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萧国，亦称后萧国，位于古萧国同一地区——安徽省萧县。萧县是萧姓的得姓之地，萧姓族徽也产生于此。从夏代的嬴姓萧国萧孟亏，到春秋子姓萧国萧大心，间隔1300余年。嬴姓萧国灭亡后，其子孙散居各地，家族势单力薄，相关事迹在史籍中记载甚少，世系传承中断。

周代《世本》记载：“子姓有萧氏。”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称：“宋萧叔以讨南宫长万有功，受封于萧，列附庸之国。汉相国萧何即其后。”唐李泰《括地志辑校》载：“萧县，古萧叔之国。春秋时为宋附庸。”唐林宝《元和姓纂》记：“汉相萧何，沛人，本自萧叔大心。”宋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云：“萧氏，子姓。杜预曰：古之萧国也。其地即徐州萧县是也，后为宋所并。”史书记载，萧大心以降世系清晰：萧大心→萧玉→萧和→萧桂→萧锦→萧泉→萧焕→萧荣→萧溥→萧仁→萧佐→萧博→萧不疑→萧琳→萧何。因此，中华萧氏宗亲尊萧叔大心为萧姓开姓始祖，这是萧姓文化的核心源头。子姓萧氏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，是构成今天萧氏庞大族群的主体。

萧若然

鲁西南风情

晒地瓜干

儿歌曰：红旗飘，绿旗扬；光种地，不打粮；分麦子，用碗量；地瓜干，当细粮；山芋叶子当口粮，鸡腚眼子当银行；瞎胡闹腾不久长，换个法子比这强。

霜降一过，地里的红薯就开始变甜了。黄河滩区多沙土地，产的地瓜又面又甜，很受欢迎。

地瓜收获后，为长期储存，一般会切成片，均匀铺在箔上、席上、石头上或房顶上，晒成地瓜干。

先将地瓜削去皮，那些半透明的紫色外皮，一片片蜷曲着，像一只只小耳朵。外皮去掉，白白的薯肉显露出来，渗出细密的汁液，沾在指间会凝成黏腻的糖霜。

清晨的露水还没散尽，薯片表面挂着细小的水珠，在朝阳下闪着碎钻似的光。这时节的阳光最是金贵，不燥不烈，能把甜味一点点收进薯肉里。

三两天后，地瓜干晒干了，硬中带韧，咬开时还能扯出白色的糖丝。撩起衣襟，用簸箕收起晒好的瓜干，存放在透气的布袋里。薯干顺着布袋口哗啦啦倒入，扬起细小的甜尘。

地瓜干吃的时候，可磨成面粉蒸窝头，或直接放进锅里煮，捞出来便吃。地瓜干最宜配玉米粥，整片或掰成碎块，用铁锅柴火慢炖，此种吃法最是温润暖心。

别看地瓜面粉白生生的，蒸出的窝头却是黑褐色的，很粘，吃起来甜腻腻的。听大人们说，以前挨饿的年月里，常吃上面发下来的救济粮，大多都是地瓜干。

如今，地瓜多用来制作淀粉，做成粉条，便于存放、运输，也是很好的配菜。更常见的吃法是蒸煮新鲜地瓜，切块在玉米粥里煮，又软又甜。或者直接上笼屉蒸，原汁原味。

泗水山区盛产地瓜，去年暑假去那里参加省作协举办的基层作家培训班，回来时买了两袋地瓜干，包装精美，切成小块，喝粥时放进去煮，味道似乎不如从前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何以成武

胡松夏

岁月流转，寒暑交替。成武，这座延续了千年的古县，以独特的文化魅力穿越漫长时空，书写了鲁西南大地上的灿烂与辉煌。

以石为卷，握凿凝神，将一块块静默的青石铺满文字，记录独特的历史，镌刻时代的经典，或留下褒奖与缅怀。于是，石上的“云烟”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成武地处平原，本地不产石头，所有石料皆取自百里之外的羊山。经过工匠们辛苦地采料、选料、运输、打磨与镌刻，一座座风格多元、内容各异的石碑与其他石件便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凿刀闪烁，石沫飞溅，历经一道道严谨工序，张寿墓碑（蔡邕书）、孔子庙堂碑（虞世南书）、张成墓碑（赵孟頫书）以及王庭筠的诗碑等，成为成武文化史上一道道绚丽的风景。而在众多珍贵碑刻中，虞世南所书的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尤为突出，被金石界与书法界誉为瑰宝。

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，亦称“东庙堂碑”，现藏于成武县博物馆。文采斐然的碑文、圆劲秀润的笔法、棱角匀称的碑身，无不成为艺术的经典。

公元626年（唐武德九年），书法家虞世南奉命撰文并书写《孔子庙堂碑》。碑文以骈体记述孔子创立儒教对社会的影响，赞颂唐朝政府治国安邦的丰功伟绩，以及封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与修葺孔庙等事。全文2000余字，洋洋洒洒，极富文采。据传，“立碑之后，车马集于碑下，捶拓无虚日，不久碑即毁，后相王李旦重刻，又毁。”因此，《孔子庙堂碑》的唐拓本极为珍贵。

随后，陆续出现《孔子庙堂碑》的摹刻本。千年流传至今的摹刻本仅存两种：一处在山东成武县，称“城武本”或“东庙堂”；另一处在陕西西安碑林，世称“陕本”或“西庙堂”。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碑身高2.9米，宽0.89米，厚0.22米，无首、无座，未刻摹刻年月与摹刻者姓名，石碑的摹刻年代遂成千古之谜。而“陕本”因刻有摹刻者姓名及摹刻时间，一切皆有清晰的历史脉络。

历史为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笼罩了重重迷雾，也为孜孜不倦的学者留下多种探寻的路径。每一种可能都为接近真相提供了线索。关于其摹刻时间，历来众说纷纭：有研究者提出是元惠宗至正年间，也有学者从岁月深处找出翔实史料，坚持认为是北宋摹刻。我更倾向于“北宋摹刻”之说。

学术探寻是抵达真相之前的艰难跋涉，如江河汇流，应包容所有观点，碰撞或交锋。我们需借助史料的光亮与温度，逐步拂去岁月的迷雾与尘埃。

公元1366年（元至正二十六年），著名藏书家、诗人虞堪为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作序，称该碑“因定陶河决得之”，此为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最早的序。后清人甘扬声又为之作跋：“闻碑因浚河出，其有神物呵护耶”。由此可知，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在至正二十六年前曾因故埋入地下，至正年间发生源自定陶的河患，疏浚河道时重新出土。虞堪序文说明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其实早已存在，元至正年间仅为重新出土，甘扬声的跋文进一步补正这一点。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在为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作跋时，也认为：“陕本泐处，此具有之”，并根据虞堪序文断定：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“则非宋后刻也”。

其实，在探寻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摹刻年代时，还需提及一位历史人物——北宋宰相庞籍。庞籍为宋初成武人，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官，天圣五年（公元1027年）奉诏编修敕令，参与《天圣编敕》的制定，后官至宰相，监修国史。以其阅历与地位，有机会获得《孔子庙堂碑》的唐初拓本。庞籍为官期间，不仅参与家乡成武孔庙的修建，还为之撰写碑文。当时，庞籍回成武时是否携带《孔子庙堂碑》的唐拓本？是否令人复刻于成武？这又成为一桩历史悬案。

今天，我们或许已无法确知“城武本”《孔子庙堂碑》的具体摹刻时间，但可清楚了解：因六百多年前一次意外的洪水，此碑从河流溃堤处的泥土中重见天日，引来世人关注，后被移至成武文庙，成为人们观摩学习的碑刻。再后来，因碑身修长平坦，一度成为糖果厂晾晒成品的台案与机器基座。虽略有破损，却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碑文。而蔡邕所书的张寿墓碑则命运多舛，被人从中间凿空，历经千年，终以残缺之身成为另一古碑的碑座，致使碑文残缺不全，留下永远的遗憾。

何以成武？因其历史之悠久，文化之厚重。

早在新石器时期，先民已在成武大地上居住繁衍。周初地属郜国，秦时置县“成武”，后改为“城武”，再复为“成武”，两千多年来，“成武”之名读音未变。县境内还有“秬”“郜”等古国遗址，漫长历史造就了丰厚的地域文化。相传，孔子弟子曾参曾与冉雍、冉耕、冉求在县城西北的文亭山上探讨学术，相互切磋，留下“曾子与三冉会文”的佳话。

何以成武？因其独特的石上“云烟”，也因勤劳的人民。

时光无痕，饱经沧桑的石碑已成为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成为后人叩问历史的“钥匙”。文化传承从未停滞，无论是荀变、张寿、孙期、祝维岳、庞籍、苗好谦、胡海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先贤代表，还是新时代的成武人民，都将传承与创新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。

如今，成武这座拥有“孔子庙堂碑”的千年古县，正沐浴新时代的朝阳，迸发出强劲生命力，华丽蝶变为“鹰击长空”的水韵新城，谱写新时代跨越与崛起的传奇。